

齐兵学与古代军事文化

徐光启的军事思想

范中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徐光启生活于社会历史转变较大的时代,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的形势下,满怀爱国热忱,在军事上力图用西方传入的技术装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部队,改变明廷面临的危局。徐光启提出坚甲利器 and 实选实练是建设一支精锐部队的根本途径。还具体提出了如何实现坚甲利器和实选实练的办法。为了挽救明王朝衰弱的形势,徐光启对边海防既提出了总体战略,也提出了局部战略,既提出了战略问题,也提出了战术问题。

关键词:徐光启;军事思想;坚甲利器;实选实练;边海防

中图分类号:E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15)04-0042-07

一、徐光启的政治军事活动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他出身平民,曾祖时是自食其力的农户,祖父时弃农经商,家渐富裕,但祖父中年逝去,留下孤儿寡母,商业靠二外姓支撑。这时倭寇侵扰上海,徐家避难外地,家产遭到劫掠。倭寇侵扰过后,徐家财产一分为三,给为其支撑商业的二外姓各一分,所剩一分,又遭盗窃,徐家陷入贫困境地。徐光启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之中。他20岁(万历九年,1581)为金山卫诸生,这之后因家境贫苦,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研读。36岁(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举,43岁(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从此他开始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到72岁(崇祯六年,1633)去世,历时二十九年。在这二十九年当中,他先后任翰林院检讨、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及管理练兵事务、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

徐光启生活的时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已经到了东方,他们除进行武力掠夺外,还派遣一些传教士进行宗教活动。这些传教士也带来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国内明廷的政治更加腐败,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更加反动,宦官专权,横行无忌,打击迫害代表中小地主和中级官吏的知识分子,党争愈演愈烈。

王公、勋戚、大地主兼并土地严重,阶级矛盾激化。辽东女真人正在兴起,民族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徐光启从小就有为国为民的抱负。他“感愤倭奴蹂践,梓里丘墟,因而诵读之暇,稍习兵家言”^{[1]454}。考取进士之后,他鉴于明边防军备废弛,上疏请求选练士兵,加强防卫。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兴兵进犯,朝廷大臣议论纷纷,徐光启更加注意军事。第二年,他连续上疏,提出御敌之策,并指出杨镐四路进兵,大错特错,必然失败。这年十月,他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他想练精兵2万,但兵源不足,粮饷不济,武器装备没有着落,尽管做了最大努力,才勉强选了4000多兵丁。政府又要将这些士兵开往前方,徐光启的练兵计划失败了。天启元年(1621年)他告病假回到了天津。

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复礼部右侍郎职,并任詹事府詹事,再次从事政治活动。第二年,他升任礼部左侍郎,管理部事。崇祯三年(1630),后金军攻打到近畿,朱由检命徐光启协同料理守城守备事宜。他进一步提出了守城、制造火器和练兵的计划,力图训练出一支以火器装备的精锐部队,挽救明廷的衰败局势,但又落空。崇祯五年(1632),徐光启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第二年又升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又进为光禄大夫左柱国,但他已年

收稿日期:2015-06-28

作者简介:范中义(1935—),男,辽宁北镇人,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军事历史。

迈,于崇祯六年病逝。

徐光启生活于社会历史转变较大的时代,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西方文化已传入中国的形势下,他满怀爱国热忱,在军事上力图用西方传入的技术装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部队,改变明廷面临的危局;在科学上,他介绍了不少科学知识,结合中国古代科学知识和实际,对农学、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二、军队建设思想

徐光启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当辽东的局势还未出现危机的时候,为了对付鞑靼和朵颜等三卫,就提出要练“得胜兵”,辽东局势危机后,更加强调要练“精兵”。他说:“千筹百计,总以精兵为根本。若无精兵,虽多得良将无可,多有奇谋不得用,多造利器莫能用,多结外援弗敢用也。”^{[1]109}这是从明军多为乌合之众,见敌即溃,而努尔哈赤的军队积强久练,步骑俱精的实际出发的,但也道出了一个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兵一定要精。徐光启认为,欲得精兵,必须选练。他说:“戡定祸乱,不免用兵,用兵之要,全在选练。”^{[1]98}又说:“战胜守固,必藉强兵;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练。”^{[1]174}如果只讲用兵方略,而不从兵器甲冑、士兵战马等方面入手,逐一加以讲求,那是无济于事的。一个坚甲利器,一个实选实练,这就是徐光启提出来的建设一支精锐部队的两个根本途径。他还具体提出了如何实现坚甲利器和实选实练的办法。下边分别做些叙述。

(一)坚甲利器。徐光启继承了“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汉书·晁错传》)的思想,认为“一切盔甲、面具、臂手、刀剑、矛戟、车仗、牌盾、大小火器之类,务求精密坚致,锋利猛烈,数倍于奴”^{[1]109}。“若有人无器,则人非我有矣。”^{[1]309}在利器中,他尤其重视火器,认为“今守城全赖火器”^{[1]270}。他所讲的火器,主要是指西方的大炮。他说:“夫兵器至于大炮,至猛至烈,无有他器可以逾之。”^{[1]310}要想战胜敌人,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他强调制造火器要精。求精之法,对于西洋火器就是要尽用彼术,毫厘不差,即不走样的模仿;对于已有的火器,要选择能工巧匠制造,“除积弊,立成规,酌旧法,出新意”^{[1]109}。或者让用武器

的人自己请人制造,然后国家出钱;或者让造兵器的人,造后自己试验。总之一定要达到精良,盔甲使敌不能射穿,鸟铳膛直、柄长,照门、照星毫米不差,火门、机轨、药囊诸器样样便利。

当然,要想真正发挥火器的威力,使它成为自己的独有优势,还应有与之相匹配的装备和设施。徐光启说:“守城必造敌台,必造大小火铳,一一如法而后可言战。必须多用大小火铳,载以炮车,杂以战车,又须坚甲利器,厚饷精兵,一一与铳相称而后。”^{[1]208}这里所说的要与铳相称,除精兵外,最重要的有二:一是炮台,一是战车。

守城必造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1]175}。徐光启要造的敌台称之为“附城敌台”,圆形,一面与城相接,三面可打击敌人。

敌台早已有之,尤以隆庆至万历初年戚继光在蓟镇长城上所建的空心敌台最为有名。戚继光所建空心敌台,“高五丈(后改为三丈),四面广十二丈,虚中为三层,可住百夫。器械粮,设备具足”^{[2]54}。从现存的空心敌台看,不是三层,只有两层,而四面有的达十七八丈。这种敌台不是圆形,而是方形。每一台配备的火器有佛狼机八架、神快枪八支、火箭五百枚,石炮五十位。火力较强,且在冲要之处,两台火力可以相交。因此敌人突破城墙是困难的。它有效地保卫了蓟镇。

同戚继光所建的敌台相比,徐光启要造的敌台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大、坚、厚。所说的大,是指它是一个庞大的军事设施。整个台为三层,一、二层施放火器,第三层为望楼,共高9丈。其第一层墙高4丈,全直径15丈,外围周47丈,台基掘地3丈,台内有井;所说的坚厚,是指它构筑得十分坚固,包括立柱、拱券,完全以砖石为材料,墙厚1丈。因为它坚固庞大,徐光启有时也称其为铳城。这种庞大的敌台可以配置众多的火器,能强有力地打击攻城者,而敌人则很难攻破此台。所以徐光启说:“臣再四思维,独有铸造大炮、建立敌台一节,可保无虞。”^{[1]111}确实如此。戚继光在长城上所建的敌台,敌人是难以攻破的,这种高、大、厚是戚继光所建三倍的敌台,敌人就更难以攻破了。

徐光启要造战车有两个目的:第一,要战胜敌人,必用战车。骑不胜车,古已有之。在有火器的情况下,以车载火器,更能战胜敌人的骑兵。第二,车可卫铳。要保证大炮不落入敌人之手,必须用车来保护。

战车的使用开始于殷商,盛行于春秋。这之后逐渐衰落。明正统之后战车又兴起,但和古代的不同。明代的战车实为火器车。到嘉靖年间,俞大猷首先将战车用于实战。嘉靖三十九年(1560)大同镇以俞大猷所训练的“车百辆,步骑三千,挫虏十余万众于安银堡”。到隆庆、万历年间戚继光在蓟镇建成车营 12 座,俞大猷训练京军车营 10 座。可见战车不是徐光启的创建。但他的战车仍有其特点。徐光启所造战车组成的车营的特点是战车多,火力强,防御性能好。徐光启建立的车营称为“四应之阵”,“重车为卫,杂以铳车,二车之外,复有盾车,盾车之外,复有拒马,守捍三属,固无可攻之理”^{[1]287}。足见其防御性能好。战车的种类多,火力强。它用双轮车 120 辆,炮车 120 辆,粮车 60 辆,共 300 辆。西洋大炮 16 位,中炮 8 位,鹰嘴铳 100 门,鸟嘴铳 1200 门,还有其他兵器、甲冑,士兵共 4000 人。正因为如此,它能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卫自己。

而戚继光在蓟镇的车营只有重车 128 辆,所组成的车营称为车步骑营,即有车兵(实为炮兵)、步兵和骑兵。整个车步骑营的火器是大将军 8 位、佛狼机 256 架、虎蹲炮 60 位、鸟铳 944 杆、快枪 432 枝、火箭 27300 枚。俞大猷所训练的京营也是车步骑营,全营有佛郎机 240 架、涌珠炮 240 位、夹靶枪 480 杆、快枪 240 枝,大小火器共 1200 件。应该说戚继光和俞大猷的车步骑营火器是较强的,但仍没有徐光启的车营火器强。特别是徐光启的车营有西洋大炮 16 位,是戚继光的无敌大将军不能比的,更不用说虎蹲炮和佛郎机了。但他的车营没有骑兵,进攻能力不如车步骑营。

讲究武器装备的精良,特别注重西方火器是徐光启建军中的一大特点。他提出“火器者今之时务也”^{[1]207},并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尽用其术”,主张完全效法西方。这当然有照搬之嫌,但在当时情况下,这恐怕是首先应采取的唯一的正确的做法。只有先拿来,学到手,然后才能谈改进和发展。徐光启不保守,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以保卫自己的国家,这点则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随着西洋大炮的引进,他提出了敌台、战车、坚甲利器、厚饷精兵,“一一与铳相称”的主张,使所构筑的敌台、建立的车营比隆庆和万历初年戚继光所建的敌台、车营都更具特色。应该说,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一种发展。徐光启的主张如能实现,不仅有可能阻止努尔哈赤的进一步扩张,且

使中国的军事技术接近或赶上西方的水平,其后果甚至会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徐光启重视引进西方武器和强调武器装备要精良,但不能说他是唯武器论者。这里关键是他重视人的作用。他说:“千筹百计,总以精兵为根本”^{[1]109},认为:“有神器而无精甲利兵,终不可战”^{[1]466},如果没有精兵,“多造利器莫能用”^{[1]109},“有器无人,则器反为敌有矣”^{[1]309}。既强调武器,又强调人,而以精兵为根本,这种思想是正确的,是建立一支精锐部队所必须的。

(二)选练。徐光启认为练兵必先选兵,“兵不选而遽练,如熔铁求金,舂沙作米,毕竟无有,虚费工力也”^{[1]122}。所谓选,就是要“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材异能之士”,因为这些人“其体质本领既是人间英物,必能以忠义自许,必愿以功名自见,如此而加之政教服习,取数既少,即粮饷可以从厚,器甲可以求精,以之御敌,能保全胜也。”^{[1]122}

勇力捷技是徐光启选兵的四条标准。

“勇之凡四:胆、智(帷幄、谋议)、手(力捷、技足)、口(行使、用间)。”(徐光启《兵机要诀·兵法选练百字诀》)但勇不可能进行度量,必须慢慢地考察,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知道。不过选择时也可以略见端倪,这就是看神、气,“色壮而恒,气猛而沉,目静而朗,此勇之端也”(徐光启《选练条格·选士》)。

“力之凡有三:曰举、曰挽、曰跲。”(徐光启《选练条格·选士》)举,指举重,推举、挺举的力量;挽,指挽强、拉力,此二者均指臂力。跲,指跲弩,踏力,即腿力。

“捷之凡有三:曰超、曰走、曰获。”(徐光启《选练条格·选士》)超,指跃起、跳越,即跳得高,跳得远;走,指疾行,走得快;获,指接取,即能迅速接获来物。总之是要四肢强健敏捷。

“技之凡有五:曰远、曰长、曰短、曰奇、曰骑。”(徐光启《选练条格·选士》)远,指善用弓矢、弩、铳;长,指善用长枪;短,指善用短枪、棍、棒、铍、镰、刀、剑之类……;奇,指善使镖枪、飞箭之类;骑,指善骑马,能左右踞马,能在马上强弓命中,并熟练地使用枪刀。

徐光启的选兵思想独具一格。在明代,到了嘉靖年间人们是强调选兵的。选兵的标准各有不同。俞大猷的提出的标准是目光有神,力能举二百斤以上,年龄在 20 至 30 之间。戚继光的选兵标准既有独创性也更全面。他注重士兵的成份,

只要乡野老实之人,不要城市油滑之徒;不光注重重力大等,而是精神力貌兼收,必胆为主。徐光启的选兵标准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更多地注重体力、敏捷和技艺,而且标准都相当高。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明军在辽东“数败之后,畏敌甚矣;非得绝力绝技,目无全虏,欢然建斗者以为之倡,必无胜理”^{[1]308}。谭纶按俞大猷的练兵方法练出了一支能抗御倭寇的精兵,戚继光则练出了一支倭寇畏之如虎的战无不胜的戚家军,而徐光启则没有按照他的选兵标准组建起一支队伍。为什么?其原因之一是他选兵标准太高,太理想化,想法是好的,但难以组建成军。

徐光启同其他军事家一样注重编伍。他认为束伍是教练根本,治军首务。又说:“用兵之法全在分数,欲明分数全在束伍。”(徐光启《选练条格·束伍》)他对各地招募来的兵,首先是按照标准进行选拔,不合乎条件的淘汰掉;对合乎条件的要根据其才力技艺情况,分别等级注册,记下他们身材、年貌、疤记,以杜绝顶冒。然后编伍,其伍法也是五人为伍,内一伍长。“四伍合之,为两鸳鸯伍,别立队长一人,并火兵四人为中伍,共二十五人为一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分左右前后中,别立哨总一人,杂流四人,共一百三十人为一哨。”“五哨六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后中,立千总一人,杂流十九人,共六百七十人为一部。”“五部三千三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后中,立将官一人,杂流九十九人,共三千四百五十人,为一营。”(徐光启《选练条格·束伍》)即徐光启所要建立的这支军队是五进制的伍、队、哨、部、营。其武器装备是一伍中“选壮大老成者一人为狼筅手,选长健便捷者两人为长枪手,选精悍短小者两人为短器手”(徐光启《选练条格·伍艺》)。短器为钹、刀、镰、棍。这种编伍同其他军事家一样,使同伍的人住在一起,互相监督,以便习武,并防止逃跑。

这种组织编制和武器装备既继承了前人的组织编制和配备武器的办法,又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五人为伍,这是从明代的卫所军到招募的军队都实行的一种束伍办法。第二,二十五人为队不是卫所军的编制,但也是前人就有的。王守仁对选出民兵的编制是“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有小甲”^[3];李遂在《御倭军事家条款》中则以五人为伍,伍有长,二十五人为甲,甲有长。不过,徐光启以二十五人为队又和王守仁、李遂的不同,他这二十五人中有四名火兵,并且有两个鸳鸯伍,而火兵

和鸳鸯伍又是戚继光小队的编制,而戚继光是以12人为一队,队有1名伙兵。可见徐光启军队的编制是前人军队编制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编制。他的武器装备也和前人不同。戚继光的鸳鸯阵一伍的武器装备是一盾牌、一狼筅、两长枪、一短兵。而徐光启去掉了一盾牌,增加了一短兵。其武器配置的顺序也发生了变化,戚继光的盾牌在前,而徐光启增加的短兵在后。这又显示出徐光启武器装备的特点,继承前人的又有自己的改变。

对选好编好之兵,徐光启强调练。他说:“即使精加挑选,人人出贼之上”^{[1]109}的士兵,也还是要练。因为这些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士兵,“技艺法制,在在各别,难以合营。且诸方各有所长,各有所蔽;其长者或宜于昔,不宜于今。必求齐众若一,分合如意,守莫能攻,战莫能敌,计非选练不可”^{[1]109—110}。

徐光启认为练兵主要是练胆气、练技艺、练形名、练营阵。他继承了前人好的经验,并结合当时火器普遍装备部队(指他要选练的精锐部队)的实际情况,有所发挥。如练胆,他强调三个字:怒、耻、习。孙子说:“杀敌者,怒也。”(《孙子·作战篇》)就是使士兵仇恨敌人。耻,是以道德礼义教育士兵,使他们明白什么是耻辱。《吴子》说:“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吴子·图国第一》)习,是使士兵精习技艺,艺高人胆大。以往的军事家也强调练胆,但侧重不同。如戚继光强调身率之道,“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俞大猷强调练胆必先练艺,技精则胆壮。徐光启则二者兼而有之,当然他的怒、耻并不能包括戚继光的全部内容,但整体看来,较以往全面一些。又如练兵,先从单兵的技艺开始,练营阵“宜先从一伍始,伍合成队,队合成哨,哨合成部,部合成营,营合成为大军”(徐光启《选练条格·营阵》)等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大体都是继承前人的,但也提出“练远器先铳炮,次弓矢”,“练长器,先长枪,次狼筅”,“鸟铳最利,上自将领,下至火兵,人人俱要打放精熟”,“短刀亦人人该学”(徐光启《选练条格·练艺》),并得出远技要达到的目标是“远、速、的”三个字。就是火器等射得要远、要快、要准。这些又是结合当时的情况,对以前练兵的总结和发挥。

再如,他把兵分为四等,采取在训练中逐渐晋升的办法。他把招募的士兵分为队兵、锋兵二等,

一起训练。队兵经过训练有长进可升为锋兵；锋兵有长进，优秀的可升为壮士；壮士优秀的可升为上士。待上士要以武举之礼，待壮士要以武学生之礼。队长、哨官缺额，要从上士中经过角技选拔；千总、把总缺额要从队长、哨官中，经过角技补充；将领缺额，从千把总中，经过角技补充。如果士兵中有殊材异能之人，也可以直接晋升上士，甚至将领。各等士兵的薪饷也不同，队兵月饷一两二钱，每升一等增加二钱，上士三两。以往的训练，技艺有长进的只是赏，而徐光启把技艺的提高同薪饷、升官紧紧联系在起，并作为一种制度。这是很大进步。它不仅极大激励士兵的练艺热情，而且打破了封建的升官靠世袭、门第的制度，是一种进步。

徐光启力图通过实选实练，精选精练建立一支比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更加精锐的部队，以抗击并征服努尔哈赤。他的主张是好的，继承和发展了前人选兵、练兵某些思想，如真能实现，也确实能挽救辽东的危局。但不仅当时的腐败的政府使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就这种主张本身要变成现实也有一定的困难。他的选兵标准太高，要在全中国范围内选拔，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难的。嘉靖年间的戚继光也主张选兵，但一则标准没有那么高，一则地区较小，所以实行起来比较容易。与戚继光的选兵比起来，徐光启的选兵未免有些理想化和脱离实际。这是他练兵失败的原因之一。

总之，徐光启提出选精兵，择良将，配备精良武器西洋大炮，严加训练，建立臂指相使，虽赴汤蹈火，无不如意之精锐部队。这一切都是针对崛起辽东的努尔哈赤的。他的这些思想既继承了传统的某些军事思想，又根据西方火器的引进，敌情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建军思想。徐光启的建军思想颇具时代特色。

三、边海防战略战术

徐光启为了挽救明王朝衰弱的形势，对边海防既提出了总体战略，也提出了局部战略，既提出了战略问题，也提出了战术问题。

他的总体战略思想就是富国强兵。他认为“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1]454}。所谓本业就是农业，就是“务农贵粟”^{[1]8}，使国家财用富裕，边防粮饷充足。这是“安边足用之本”，“万全之策”^{[1]10}。所谓有正兵，就是训练“得胜兵”，“先求

我之可以守，次求我之可以战，次求我之可以大战”^{[1]3-4}。“我能战、我能守，即款可也；否则不能战、不能守，不款不可也，款亦不可也，即款而愈久，又愈不可也。”^{[1]7}可见徐光启是把强兵作为战和的根本条件，而把富国又作为强兵的根本条件。就是说只有富国才能强兵，只有强兵才能守、能战、能大战、能和议。

（一）边防。关于边防战略，徐光启针对不同的对象以及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战略。对北方蒙古族鞑靼，提出在有精兵良将的情况下，如其内犯，则以正兵“声罪致讨”。鞑靼如果抵抗，将“犁庭扫穴”，重复永乐时五征漠北的故事。如果他远遁，不杀掠，不深入，只是先靠近边境百里左右，选择要害之地，水草丰盛之处，构筑数座城池，每城以万人进行戍守，且耕且战。凭借高墙深池，敌人尽管数万来攻，也不免顿于坚城之下，加我兵互相声援，城池是不可能被攻破的。然后逐渐向远方哨探，广布恩信，招抚那些归附的人，建立数十座城池，以过去放弃的大宁、开平为塞，东接辽东，西联独石，形成一道城塞相连的防线。这样，不过三五年，过去的土地完全都能恢复，京师自然巩固。徐光启要用步步为营的办法，恢复明初的边境，逐渐地巩固北部防卫。

如果鞑靼不是犯边，而是与我和好，为了永久和平，徐光启认为“其服，我可化也”^{[1]54}。所谓“可化”就是要鞑靼“类我”。他说：“今日之虏，惟军火器不宜予之耳，自此以外，凡可令类我者恣予之，皆大利也。”^{[1]55}就是要将华夏文化输入到鞑靼之中，使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与中原相同，他们就不会内犯了。他认为“文盛则武衰，自然之势也”。“世下渐文，亦自然之势也”^{[1]55}。如果输入华夏文化，改变他们的狩猎生活，使他们“深耕易耨，彼中多沃野，大饶矣。食于沃土之毛，必且久驻，久住必且屋居，屋居必且为城郭，屋居城郭，不必为吾患矣”^{[1]55}。在徐光启看来，鞑靼若改变了游牧的生活方式，进行农业生产，过着定居的生活，就不会内犯了。他还认为“虏之终类我也，亦百年之后，必至之势也”^{[1]55}。徐光启这一战略思想实为前人所未发，它含有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要把汉民族的文化输入到蒙古族中，使其尽快进化，尽快走向文明，应该说这对鞑靼是有利的，也是巩固明边防的治本措施。

这之前，明对鞑靼的战略基本是剿抚兼施的

两手。徐光启继承了这些,但他又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方略,即“化”,使其“类我”的方略。这就使对鞑靼的战略不仅有政治、军事方面的,还有经济、文化方面的整体战略。这是对明代边防战略的重大发展。

在辽东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光启对女真人的战略则与鞑靼不同,且不断变化。他首先提出练精兵,联合朝鲜和北关(海西女真的叶赫部)的军事进攻战略。他认为以训练的精兵出关,“益以辽士二万,北关一万,更欲徵朝鲜二万,两路牵制,一路出攻,约周岁之内,可以毕事”^{[1]455}。为了联合朝鲜,他请求亲自出使朝鲜。后来的萨尔浒之战,明廷虽然采用联合朝鲜和北关的战略,但第一没有精兵,第二战争指导错误,不是一路出击而是四路出击,互不协调。当时徐光启就指出:“四路进兵,此法大谬”,并预言努尔哈赤一定“并兵以应一路,当之者必杜将军矣”^{[1]459}。事实果如徐光启所料,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首先迎击杜松,致使明军大败。但萨尔浒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徐光启战略的错误,相反它证明了不认真执行徐光启的战略必然失败。

萨尔浒战后,辽东的形势更加危机,这时徐光启提出了重点防守的战略。他说:“今日之计,独有厚集兵势,固守辽阳,次则保全海、盖四州为上策,但须多储守之器,精讲守之法。中间惟火器最急,若得大小足备,兵将练习,寇至之日,乘城抵敌,歼其二三阵,必啖指退矣。”^{[1]461}在“人非其人,器非其器,且无将无马”的形势下,他认为“归并合力不足为怯,婴城自守不足不弱”^{[1]462}。他就是要集中兵力防守辽阳等城镇。因为在他看来,辽东是京师的左臂,如果不守辽东,敌人一天天强大,山海关以南处处设防,要比守辽东费十倍之力。

后来徐光启吸取了辽东作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了战守结合的战略,即婴城自守和野战相结合,以确保城镇无虞和进一步进取。徐光启认为守城之兵不必多,“但取可守足矣”^{[1]307}。更重要的是练就“乐战保胜”之兵,主要是车兵。徐光启提出练就6万,每2万为“一聚”,每“一聚”为5营。部署于关外一聚,关内一聚,近畿一聚。敌如攻城,城内防守之兵,婴城自守;“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制同法,器械同利”^{[1]308}的战兵(车兵),予以支援,定将粉碎敌人的进攻,保住城池。徐光启认为要练就四五营,关内就不用担忧,练就10营,关外可保无虞,如果15营兵完全练好,不仅可

以保住城池,抑制努尔哈赤扩张,而且可以进取,征服努尔哈赤。

但辽东的形势日益恶化,徐光启又提出加强京师防守的计划。他说:“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所欲缮完都城者,先固本而后及其枝叶。根本既固,人心贴然,丑虏闻之,绝意深入,乃可渐向外间作用,且战且守,直达奴巢耳。”^{[1]470}他认为如果京师防守不完固,就是山海关内外防守再严密,敌人如果绕道边外或从海道入犯,那么整个京师就要震撼;京师震撼,守在外边的将领能够一意进取吗!

在战术上,徐光启强调在进攻时用正兵,防守时婴城自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火器的出现,改变了战术。他说:“此器(指火器)习,而古来兵器十九为土苴,古来兵法十五为陈言矣。何者?正兵之胜,前无衡敌故也。今诚简我精卒,日夕肄习,悉令入彀,次乃用之。……未及接刃,已糜烂其十七八于千百步之外矣。……至乃凭藉坚城,用高临下,其于却敌,滋甚易矣”^{[1]53}。

徐光启所谓的正兵,类似戚继光的车步骑营,“其法,战车为营,大小杂置之,步兵司之,干盾自卫,间以矛刃,长短相次,铁骑居中,游奕进退,或诱其前,或击其败”^{[1]53}。到万历末期,徐光启要组建的车营,如前所述主要是火器营。精选精练的士兵熟练地使用众多的火器,比戚继光的车步骑营更进一步,完全可以同努尔哈赤的骑兵抗衡。因此,他认为,“自古以来,无有大师转战不用正兵者。不有正也,奇何自出?正以藏奇,变化无端,胜之道也”^{[1]53}。

徐光启所谓的婴城自守,就是坚壁清野,准备好大小火器,敌人进攻,凭借坚固的城池,利用火力很强的铳炮打击敌人。一个城池守得住,敌人就不敢越过此城进攻;数个城池都守得住,敌人就只有退去。他认为“古时无火器,故非战不能守城;今火炮即能杀贼于城外,是坐而胜战也”^{[1]270-271},因此,他反对在城外列营置炮,因为在城外列营置炮,一旦失败,火器皆为敌有,城池也保不住。他主张附城建置炮台,以台卫炮,以炮卫城,以城卫民。在敌人已经掌握火器的情况下,他则主张“以大胜小,以多胜寡,以精胜粗,以有捍卫胜无捍卫”^{[1]175}。

徐光启根据火器的大量运用,创立了他的攻守战法。这种根据技术变化自觉地改变战术的思想是很珍贵的。徐光启阐述的战术针对性是很强

的,如能实现是可以战胜努尔哈赤的。努尔哈赤攻城时最怕的是顿兵于坚城之下,没有把握他是不肯用兵的。攻城一旦受挫,他就会停止进攻,宁远之战就是一例。野战时,努尔哈赤主要的战术是设伏,而徐光启练车营的思想如能变成现实,伏兵很难奏效。攻城不克,野战受挫,努尔哈赤的扩张将被遏止。可见徐光启的军事思想是先进的。明军辽东的失败,不是因为当时军事落后,而是由于政治腐败,使好的军事思想不能变成现实。

(二)海防。关于海防,徐光启提出了倭寇“来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1]47}的主张。徐光启总结了明初以来中国同日本交往的历史,认为“有无相易,邦国之常”^{[1]37}。日本需要中国货,互相贸易是正常的。开官市是正路,私人货易是旁路。嘉靖年间,由于不开官市,禁止私市,富豪欠倭寇的货款不还,加以陈东、徐海等的勾引,辗转而酿成了倭患。如果实行“除盗而不除商,禁私贩而通官市”^{[1]38},海上就不会有事。他还认为市与盗是两回事,他要来入侵,你开市与否,他都会入侵。禁止同他贸易,绝不能禁止他的入侵。要阻止他的入侵,只有加强戒备。总之他主张在有备的情况下,同日本贸易;如果不加强海防,只求禁止贸易是没有用的。不仅如此,他同以往的官僚不同,认为同日本贸易对中日双方经济都有利。因为双方贸易越多,中国的丝帛等产品越有销路;中国的产品大量出口日本,日本国内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太昂贵。就海防来讲,“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1]48}。在他看来,倭寇的入侵是因为通商不得转而为盗,与其进行贸易当然就可以靖倭了。过去对日本不了解主要是由于没有通商,如果通商,

往来多了,当然对它的一举一动、纤细具知了。通过贸易,私人造船必多而坚固,一旦有事我可以把这些船变成兵船;通过贸易我还可以购买日本精致的刀、铳、器甲诸武器。我有众多兵船,有较好的武器,加上“大小众寡,主客劳佚,饥饱之不敌”,它“即有妄图,亦且息心矣”^{[1]49},因此可以“制倭”。所谓“谋倭”,就是通过贸易,我方对它了解得比较透澈,就可以利用它国内矛盾,达到使其难以入侵我国的目的。

徐光启有对倭寇侵略本质认识不足的一面^①,但他的“来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的总政策是正确的。他的除盗不除商,通商为两利之道,通商可以靖倭、知倭、制倭、谋倭等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的思想观念,露出了某些新思想的曙光,更是可贵的。

徐光启生活在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西方军事技术传入的时代。他敏锐地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技术,结合传统的中国军事思想,针对具体的作战对象,提出了一套练兵作战思想。这些思想冲破了某些传统观念,架起了由古代到近代、由冷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的桥梁,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古代军事思想的顶峰,又为近代军事思想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 [1]徐光启. 徐光启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戚继光. 戚少保奏议·请建空心台疏[M]//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二).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3]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兵符节制(卷十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王珏)

^①这认识不足的一面主要是指倭寇入侵不完全是由通商引起的。《筹海图编》载:“许二(栋)、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泊于双屿、列表。滨海之民以小舟装载货物,接济交易。夷人欺其单弱,杀而夺之。接济者不敢自往,聚数舟以为卫。其归也,许二辈遣倭一二十人持刃送之。倭人还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歆慕之心,而入寇之祸不可遏矣。”(卷十一《叙寇原》)又载:“许栋败没,直始用倭人为羽翼,破昌国而倭之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矣。”(卷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可见这些不是商人,是海盗,入寇、劫掠是他们的本性。

范中义，1935年5月生，辽宁省北镇市人。196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1964年任《人民海军》报编辑，1975年任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线》杂志编辑，1981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研究员，1995年退休。

(一)《明代军事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的重点课题《中国军事通史》其中一部,是我国第一部《明代军事史》。该书共25章,906千字,由范中义任主编,并撰写9章和绪言。(二)《明代倭寇史略》2004年出版,是戚继光研究丛书中的一部。该书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性质,认为王直等为海盜、勾结倭寇的汉奸,而不认为他们是“倭寇之首领”。(三)撰写了《筹海图编浅说》一书和《明代海防略述》一文。《中国海防史》是我国第一部海防史,全书1200千字,明代部分由范中义撰写。(四)1984年发现埋没了三百多年的戚继光撰写的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并撰写了《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成书时间和内容》一文,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范中义为该书所作的校释本。以此书为基础撰写的《戚继光兵法新说》,200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五)撰写的《戚继光传》《戚继光评传》《戚继光大传》是国内对戚继光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撰写了《俞大猷》一书和《俞大猷军事思想论述》一文,点校了俞大猷的《正气堂集》,2015年出版了《俞大猷传》,是前人未曾写过的俞大猷传略。(六)1978年发表《我国航海史上的壮举地——郑和七下西洋》,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发表的关于郑和研究的文章。1982年出版了《郑和下西洋》一书(同王振华合著)。此外还发表了《对我国古代航海史料中“更”的几点认识》《史书中的明代海船》等文章。